



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当代文库(第二辑)



商路漫漫五百年

葛贤慧◎著

Shanglu Manman Wubainian

——晋商与传统文化



山西出版集团
山西经济出版社





晋商路漫漫 五百年

葛贤慧◎著

—— 晋商与传统文化



山西出版集团
山西经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商路漫漫五百年：晋商与传统文化 / 葛贤慧著. —太原：
山西经济出版社，2009.12

ISBN 978-7-80767-261-6

I. 商… II. 葛… III. 商业史—关系—传统文化—研究—
山西省 IV. F72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29660号

商路漫漫五百年——晋商与传统文化

著 者：葛贤慧

出 版 人：赵建廷

责任编辑：董利斌

复 审：郝亚玲

终 审：郝建军

装帧设计：华胜文化

责任印制：李 健

出 版 者：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经济出版社

地 址：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

邮 编：030012

电 话：0351-4922133 (发行中心)

0351-4922085 (综合办)

E-mail: sxjfx@163.com

jingjiahb@sxskcb.com

网 址：www.sxjxcb.com

经 销 者：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承 印 者：太原红星印刷厂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：17.5

字 数：266千字

印 数：1-4000册

版 次：2009年12月 第1版

印 次：2009年12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80767-261-6

定 价：32.00元

《晋商研究当代文库》序

山西是中国商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，山西商人是中国经济史上的劲旅，明清晋商更是因创造了货通天下、汇通天下的历史奇迹而成为当时中国十大商帮之巨擘。历史晋商及其成就的辉煌事业虽然早已渐次消逝，但他们的从崛起到兴盛、由兴盛而衰落的史实却蕴藏着丰富而绚烂多彩的知识瑰宝，在经济、管理、社会、艺术、法律等多学科领域都具有重要研究价值。

山西财经大学是国内建校时间最早的财经大学之一，是从乔家大院走出来的商科大学。经济学、管理学历来是学校的支柱学科，晋商研究始终是学校科研工作的特色之一。学校有组织的晋商研究工作已有近50年的历史。

1960年，原山西财经学院成立了山西票号史料整理小组，开始了晋商史料挖掘和研究工作。经过

30年的研究，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——以《“山西票号”的性质与作用》（杨荣晖，《光明日报》1961年5月22日第4版）、《山西票号研究集·第一集》（山西财经学院1982年编印）、《山西票号研究集·第二集》（山西财经学院1984年编印）和《山西票号史料》（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初版）为主要代表，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1991年开始，原山西财经学院的晋商研究工作突破了经院范式，呈现出历史考证与现实借鉴相结合、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并举的特色。1997年10月原山西财经学院和原山西经济管理学院合并、更名为山西财经大学后，学科特色和学术传统得以继续和加强。2002年，学校建成了金融货币史博物馆。2004年，山西省教育厅依托我校建立了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——山西票号与晋商研究中心。这个阶段，我校的晋商研究视角不断拓展，研究成果更加丰硕——《山西商人及其历史启示》（孔祥毅、张正明，《山西日报》1991年11月18日、19日连载）、《山西票号史》（黄鉴晖，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初版，2002年修订）、《明清山西商人研究》（葛贤慧，香港欧亚经济出版社1992年）、《中国银行业史》（黄鉴晖，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）、《商路漫漫五百年》（葛贤慧，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）、《金融贸易史论》（孔祥毅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）、《晋商经营之道》（黄鉴晖，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年）、《明清山西商人研究》（黄鉴晖，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）、《晋商在会计发展史上的贡献》（孔祥毅，《山西财经大学学报》2002年第2期）、《山西票号史料》（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增订）、《山西票号研究》（孔祥毅、王森主编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）、《山西票号与中国商业革命》（孔祥毅，《金融研究》2002年第8期）、《金融票号史论》（孔祥毅，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）、《镖局、标期、标利与中国北方社会信用》

(孔祥毅,《金融研究》2004年第1期)、《中国钱庄史》(黄鉴晖,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年)、《中国典当业史》(黄鉴晖,山西经济出版社2006年)是其中的代表。

近年来,学校为了提高教育质量、突出办学特色,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商科大学教育教学模式的要求,明确将传承晋商文化、弘扬晋商精神作为办学的重要特色,加大了各项投入,加强了各方面的工作。2007年,学校将山西票号与晋商研究中心更名为晋商研究院,提出了将晋商文明研究向现代商业文明研究拓展的研究发展战略。

为了促进我校晋商与现代商业文明研究的开展,及时反映这方面的成果,学校责成晋商研究院编辑出版《晋商研究当代文库》。本文库不限定册数,不定期出版。2008年推出了本文库的第一辑,现在推出第二辑。今后将陆续推出新的相关研究成果。

热忱期待广大读者批评指正!

任晓生

2009年10月10日

传统文化与商人精神(代前言)

吴 慧

葛贤慧同志继与张正明同志合作《山西明清商人研究》之后，又推出了《商路漫漫五百年——晋商与传统文化》一书。完稿之时，嘱我写一前言。我多年来从事中国商业史研究工作，对明清山西商人在中国商业发展史上所作的巨大贡献钦佩不已。今读《商路漫漫五百年》书稿，更为作者对黄土文化中孕育出的山西商人精神的热情讴歌所感染，不由自主地被作者带入了那五个世纪的历史风云中，体味着山西商人在千里草原、浩瀚沙漠，在那一片广袤土地上开拓茶叶之路、驼马之路、皮毛之路……汉蒙民族生命之路的艰辛；又仿佛看到了山西商人从山清水秀的江南都邑，到无际草原与荒漠中的点点帐篷，从八闽两湖茶场到中俄茶叶大战的恰克图市场，处处留下的辛勤货殖的身影。曾执金融之牛耳的山西票号，从黄土高原的古老小城诞生，在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中走遍了全国

所有都会重镇，走出国门，打入俄国、日本、朝鲜腹地，更为100多年前的中国商业史写下了辉煌的一笔。

晋商的成功得益于天时，得益于地利，更得益于人和——一种以伦理价值观的共识凝聚起来的力量。司马迁一部《货殖列传》总结了中国历史上早期商人吸取儒道法兵诸家文化，不仅创立了有效的经营之术和早期商业理论，而且创立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货殖文化，建立了一种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贾道精神。明清山西商人，则完全继承了古代诚贾廉商的经营理念 and 伦理价值观念，进一步吸取传统文化精华，创造出富有强大生命力的商人精神。

商人精神有丰富的内涵。作为一个真正的商人，对社会有益的商人，主要应具备这样的思想素质：民族自强的爱国主义精神、重商厚商的敬业乐业精神、勤劳刻苦的奋发进取精神、纤悉计算的俭约朴实精神、笃实不欺的信义为尚精神、执乎其中的和谐为贵精神、出奇制胜的善于竞争精神和精通本行的心志专一精神。包含着这些要素的商人精神，正是以传统文化为依据、并与之保持强烈的一致性。也可以说传统文化是商人精神的思想来源，商人精神是传统文化的体现。

在商人精神中贯穿古今，首应突出的一条是爱国。因为这是大节问题，是商人安身立业的第一要义。中国古代商德正是以爱国主义为前提。

“爱国”是个新词，在传统的道德观中则涉及“忠”、“节”两字。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，其“一贯”之道就是“忠恕”。单从忠字讲，“忠”就是“尽己”，是责任心的本源。尤其在近代，在层层压力下敢与外国侵略者抗争以保国家主权，确是一种更为难能可贵的爱国行动。在江浙大丝商胡雪岩同外国商人斗法失败之后，山西却出了一个渠本翘，于爱国的争矿、赎矿运动中取得了成功，表现了山西商人昂扬的民族精神，渠氏无愧于近代爱国商人的称号。

“敬业”是商人精神的第二条内容。“敬业乐群”，语出《礼记·学记》，意思是专心学业，乐于团结互助。

山西风俗以商贾为重。“天寒地瘠，生物鲜少”，“土狭人满，田不足耕也”。经商就成了安排剩余劳力，解决生计民食的出路。由于重商立业观念和尊重商人的风尚的形成，山西人把经商谋利看作是十分荣耀的事。士农工商四民

的次序在山西颠倒过来。“生子可作商，不羨七品空堂皇。好好写字打算盘，将来住个茶票庄。”当时山西致有“以商为本”之说。甚至万里行贾，习以为常，虽远住他乡，不以身家为念。这种“贸迁四方”的精神正是山西商人重商敬业精神的表现。

勤劳，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也应该是商人精神中另一重要内涵，甚或可以说是其核心的部分。通古今之变的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，在所著的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有一个很好的概括：“无财作力，少有斗智，既饶争时”，这是商人发家的三部曲，特别是在资本微薄的条件下，要做生意只能靠勤力劳作，这也是有作为的商人所必须保持的精神，晋商正是这样的商人。在他们身上原本就具有的力农于野的耐劳精神，在商贾贸易的经济领域中更得到承传光大。可以说晋帮在商贾贸易中的成功同他们艰辛创业、吃苦耐劳的精神是密切相连的。正当徽商以沿江、沿河（运河）、东南城镇为主要活动领域之际，晋商却别出蹊径，默默地开拓着西北、蒙古（包括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我国内蒙古自治区）以至中俄恰克图贸易。他们走西口、穿草原、越沙漠，踏出了数千里长的商路。中国的茶叶，由山西商人之手源源输往蒙古，直至沙俄。人们喜欢谈论丝绸之路。然而这条“茶叶之路”实不让丝绸之路专美于前。在经商的刻苦性上，山西商人实居全国商人之冠。

俭啬是商人精神中与勤劳相连的内容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勤劳俭啬是最古老的训诫，“克勤于邦，克俭于家”，这一教谕早见于《尚书·大禹谟》。李商隐所言“历览前贤国与家，成由勤俭败由奢”，已成为商人的谚语。尤其如晋商，“俗尚勤俭，有陶唐氏之遗风”，“晋俗勤劳朴素。勤劳易于进取，朴素易于保守。故晋之人长于商，车辙马迹遍天下”。山西人的尚俭，除了受传统文化中崇俭的影响外，还有历史传统——“晋俗之俭，自古而然”。明张四维说蒲州商人王恩“厉志经营”，“尤慎于出入，终其身，未尝有锱铢滥费，盖天性然也”。清代的山西商人“隆冬走山谷，布袄外袭老羊皮马褂”而已。虽然后来太原汾州数大县商人也“颇有流于奢靡，变其本俗者”，但也仅限于局部地区，其奢也有限度，“余则俭啬，仍颇有唐魏之风”。

由于山西商人注重节俭，所以他们的资本积累较快。清康熙也说：“晋风

多俭，积累易饶”。顾公燮也为之概括：“山陕之人，富而若贫”。富而若贫的山西商人，其多余的钱财去向又如何呢？购地置产，办学赈济，这些都没有什么新意。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山西商人的资本，开始投向开矿、设坊（曲坊）、制盐（池盐）、植棉，以至经营起近代的机器采矿业（渠本翘）。商业资本与生产相结合，扶植了资本主义的新的生产关系萌芽，山西商人在这方面也开风气之渐。

信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标准，为人修身立世的行为基础。商业道德正以此为支柱，因此谈商人精神决不能忽略信义这一条。

就经商而论，一提到义就不能不想到利字。义与利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范畴。义利之辨，古已有之。伦理道德与经济利益相碰撞，不独发生在士大夫之间，而且商人更是首当其冲。如何对待义利的矛盾，儒家的态度是：“见利思义”，“见得思义”，“义然后取”（《论语·子张·宪问》）。“义，利之本也；利，义之和也”（《左传》）。晋商说“君子爱财，生财有道”；“仁中取利真君子，义内求财大丈夫”。儒家的伦理思想对他们起到了良好的影响。经商虽以营利为目的，但凡事以道德信义为根据，“故能通有无，近悦远来”，“平则人易亲，信则公道著，到处树根茎，无往而不利”，晋商中许多信孚众望的商家，其行事立业莫不透着诚信笃实的精神，正体现了中国商人伦理文化的优良传统。

传统文化中可为树立商人精神提供依据者，还有重要的一条，叫做“和谐”。

“和”在诸子中主要为儒家所揭橥。孟子说：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》）。儒学的改良者荀子同样有“上不失天时，下不失地利，中得人和，而百事不废”（《荀子·王霸》）之说；和，即“指和谐，合作或达成协议或互补”（盛洪之语），并非要强求消灭差异（至于“同”）。和谐精神，应是商人精神中最成熟的部分。“和为贵”这一口头禅，事实上确已成为山西商人立身行事的规范。他们用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，用关帝崇拜的方式，用会馆的社会机构，用商会的立法形式，增强相互之间的了解。讲赈恤、讲义气、讲相与、讲帮靠，以协调企业之间的大小矛盾，消除人际之间的不和。大德通票号号规中有一条就是“各处人位，皆取和衷为贵。在上位者，固宜宽

容爱护，慎勿偏袒；在下位者，亦当体量自重，无得放肆”。和衷共济的协调精神是山西商人数百年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原因。

司马迁说“富者必用奇胜”。出奇制胜的经营思想也是商人精神的重要内容。“出奇制胜”原是兵家之道。但是因为市场竞争也是“与人相对而争利”，货殖家想在对手如林的竞争中占有优势，立于不败之地，只靠勤俭还不够，必须通权变，讲智谋，也如用兵那样，以出其不意的竞争策略与方法去制胜。明代蒲州富商家庭出身，后进入内阁的张四维曾说过：晋商“能以心计阜通货贿，而擅其赢”。“其趋舍每发必奇中，往往牟大利。然又必循理守法，如其分非义，不以一毫苟取于人”。蒲州商人王海峰总结自己的经营诀窍是“人所弃我则取之，人所去我则就之”，正体现出其力求出奇制胜，善于竞争的精神。

精诚专一，也是商人精神的具体体现。“诚一”也出于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。司马迁在《列传》中列举了许多发财致富的人物，并说“此皆诚壹之所致”。意思是心志专一，才能卓有成果。“诚一”与“奇胜”是相辅而行的，但分属两事，是经商致富的两个必备的条件。山西商人不仅要求入号伙友必须心志专一，精益求精，而且各行各业的经营活动都有独到的特色，专门的业务知识，经营一辈子，学习一辈子，不论是深入蒙俄贸易的旅蒙商伙计，还是票号的伙友，不用全部的精力去学习掌握，是很难在号内立足的。

上面所列举商人精神的八个方面，归结成十六个字就是：爱国、敬业、勤劳、俭啬、信义、和谐、奇胜、诚一。这种有多方面含义的商人精神正是对自古以来商人经商美德的继承，也是明清时代主要商帮经商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共同经验。从商业文化内容的分类来说，前六个方面是商业文化中的伦理文化，后两个方面是商业文化中的营销文化。中国的商人精神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，但这不仅仅只适用于古代商人，而且也是现代的经商者所应树立的精神，所应遵守的原则。因为高尚的伦理道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为建设精神文明所必需，对今天的经商活动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，无疑地这已超出了历史的与社会制度的局限性。

提到文化高度来谈历史借鉴，集中精萃部分，将有深层价值的内核展示于人，这比就事论事地从具体的经商事例中寻求启示，更富有概括性和容易使人

接受的可信性，更富有增益智慧的作用，和容易使人记诵的可传性。因此，研究传统文化与商人精神的关系，正适应当前经商规范化、道德化的需要，为造就更多的现代诚贾良商提供合适的教材，迈出试验性的一步。贤慧同志的《商路漫漫五百年》正是从文化的深层内核中揭示出山西商人创造历史奇迹的精神力量，展现了活跃在明清商业历史舞台上的诚贾良商的生动形象。可以说，作者以她饱蘸激情的笔墨，为纵横商界500年的山西商人续写了一部“西帮货殖列传”。山西商人的兴与衰、成与败、经验与教训同样弥足珍贵，都应该是现代诚贾良商引为借鉴的生动教科书。

目 录

第一章 黄土文化孕育着商业文明 /001

第一节 山西商人的根扎在黄土文化的土壤中 /003

第二节 山西商人历史寻踪 /009

第三节 明清晋商在黄土高原崛起 /013

第二章 山西商人的创业之路 /033

第一节 从九边向淮扬进军的山西盐商集团 /034

第二节 活跃在边镇互市市场的山西边商集团 /039

第三节 闯出杀虎口的旅蒙商集团 /045

第四节 中俄贸易中的山西茶商集团 /079

第五节 异军突起的山西票商集团 /085

第三章 天地之性人为贵 /099

第一节 从天下最穷到天下最富 /100

第二节 人和的力量是无敌的 /107

第三节 票庄之生计在于用人 /116

第四章 山西人的重商与重教 /125

第一节 学而优则商 /126

第二节 渠氏、乔氏、常氏的家族文化 /143

第三节 家法与商规 /166

第五章 晋商伦理之魂 /181

第一节 商人伦理之本源 /182

第二节 利以义制,名以清修——山西商人的伦理价值观 /185

第三节 用儒意以通积贮之理——山西商人的经营之道 /194

第四节 山西商人会馆与关公文化 /207

第六章 辉煌的衰落 /22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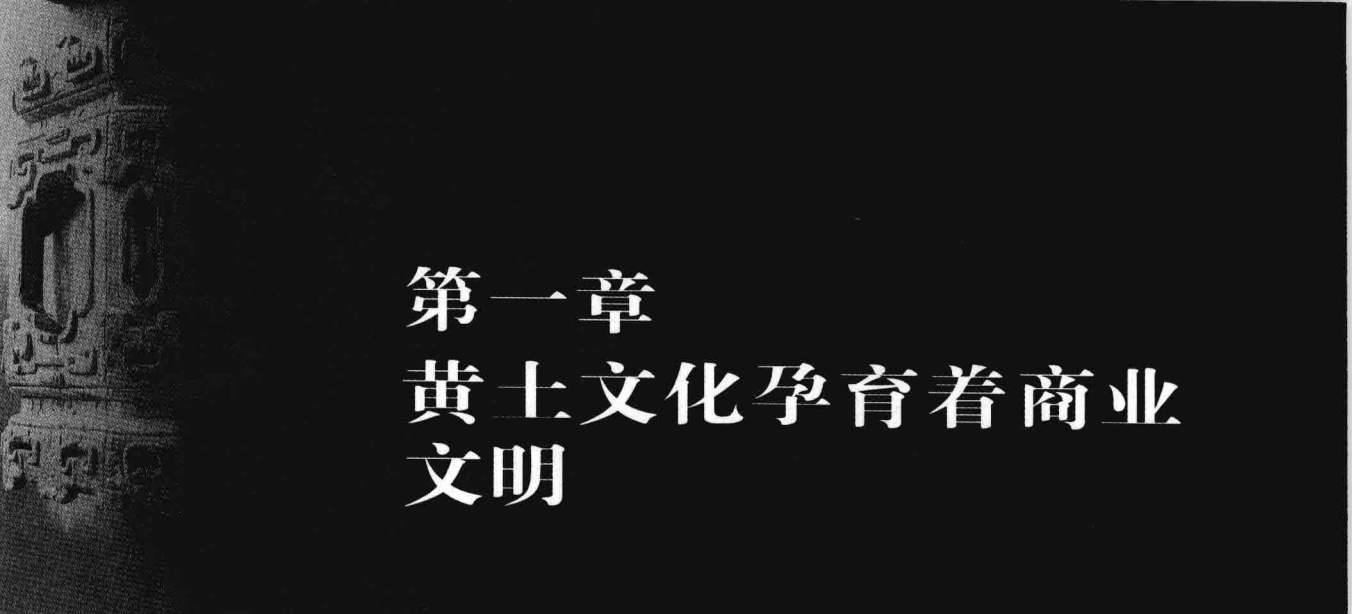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节 保晋爱国的历史使命 /226

第二节 开山西近代工业之先河 /231

第三节 悲壮的历史瞬间 /235

后记 /264

修订版后记 /265



第一章 黄土文化孕育着商业文明

提起山西，人们自然把她和黄土高原联在一起。山西东部的太行山绵延起伏 400 多公里，最高岭脊海拔 2000 多米。山脉向山西腹地纵深百余里，就像天然筑起的一道屏障，由北而南把山西和那只有海拔几十米高的绿色的华北平原隔断，成为山西与河北、河南的天然地理分界线。山西西部的黄河则从北而南一泻千里，冲出一条宽宽的沟壑，阻断了秦晋的联结。

由于太行山这道天然屏障的阻隔，来自海洋的温湿气流，只能在山前回旋，使山西这块黄土高原得不到它的滋润。但是这块黄土地却不得不敞开胸膛，裸露着肌肤，去承受来自欧亚大陆型风沙的侵蚀。寒冬苦长，无霜期苦短，春日常被无尽的风沙搅得昏天黑地。即使在农作物生长的黄金季节，也不是所有土地都能耕种。山西腹地从北到南、从东到西，大都山脉纵横、犬牙交错。除太行山外，恒山、五台山、系舟山、太岳山、中条山、吕梁山重峦叠嶂，由东北向西南延伸，留给人们的可耕地面积不到土地面积的 30%，山区的可耕地大约只有 10%。

如果历史倒退回数百年，那么山西的地理环境和自然

条件又是一番什么景象呢？

清人康基田在《晋乘蒐（sōu）略》中给山西总结了三句话：“无平地沃土之饶，无水泉灌溉之益，无舟车鱼米之利”。这“三无”说，可谓最恰当地概括了山西在明清时代的地理自然风貌。山西的大部分城乡都邑，都是“七狭人满”，“天寒地瘠，生物鲜少”，“岗陵丘阜，硗薄难耕”……黄土高原给山西人民营造了一个十分艰苦的生活环境。

然而，山西商人正是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崛起。从明至清，历经五个世纪的历史风云，从漠北的千里草原、无际荒漠到江南水乡、都邑重镇，从八闽两湖茶场到中俄茶叶大战的恰克图市场，从东北长白山下到西北天山山麓，山西商人驰骋纵横，艰苦跋涉，由弱而强，集成成帮，盐商、边商、旅蒙商、茶商、票号商……由区域性市场向全国市场拓展，进而闯出国门，踏入国际市场，成为声震海内外的商界劲旅。至清代咸丰（1851～1861年）年间，山西省因商而富，由天下最穷一跃成为与广东并称的天下最富省份。人们对这个黄土高原的内陆省开始刮目相看，开始重新认识这里的土地，这里的人民，这里的习俗、文化，寻找称雄 500 年的山西商人的精神源泉。

